

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儒教文化影响

张冠增

按照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说法，中国城市理论的萌芽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。周代时的大都城规划虽然是一种理想的模式，在以后的历代城市中也罕有实现者，但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思维指标，对日后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随后三千多年的社会演进中，这个理论被不断地继承、发展和更新，成为华夏文明中最具典型的传统之一。如果把周朝城市的规模性建设看作是城市化的第一次高潮的话，那么秦汉时代就无疑迎来了第二次城市的大发展期，隋和唐则进一步为整个东亚地区的城市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。此后一直到宋元明清历代，中国的城市理论和发展形态基本上都是沿袭古人的，再没有任何显著的变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城市文明最为发达的汉唐时代，也是儒家思想高度兴旺发展的时期。因此，儒家的理论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的规划与布局，而且成为历朝历代建城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。探讨儒家文化与城市发展，可以更接近地观察中国城市规划的革新与发展，了解更深层的中华思想和文化特点，本稿就是出于这样一个研究的目的。

一、儒教的思想体系与载体

诞生中华文化的摇篮是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与环境：那里气候温和，土壤肥沃，四季分明，操持农业就可以安居乐业，因此培养起先民对自然深厚的感情。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学术宗旨，基本上就是阐述对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。比如《易经·象传》就提出：“裁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”，提倡“与天地合德”的人格思想。换成现代的语言，就是一方面要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，采取符合自然规律的行为，另一方面要肯定主体的能动作用。司马迁也说过：“欲以明天人之际，同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“司见古人极其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”。城市理论是华夏文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充分体现出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。比如在城市的选址和建设方面都有严格的理论依据，历史上夏、商、周三代王都的多次迁移，除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之外，主要是满足理论上的要求，寻找更适于人类生存和王朝发展的环境。

在现代科技发达之前，人们在保护环境、协调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朴素思想，就是儒教中“天人合一”精神的最高体现。近代史学巨擘王国维曾指出：“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，莫剧于殷周之际”（《殷周制度论》）。从夏商两代到西周，“天人合一”精神始终是中国的主流思潮。比如在春秋时代，主张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思想就体现在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文献之中。《尚书》里说的很清楚，“天乃锡禹洪范九畴，彝伦攸叙”，意思是上天赐给大禹九种大法，从而奠定了治理国家的大道，所以说人应该以天的意志来行事。到了宋明以后，天人合一的思想更加波澜壮阔，

但主要是把修身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。这样，排外的中心结构（华夷之别），以儒教的礼为基础的、整齐有序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符合天文地理条件的风水观等，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城市社会的基本特点。

从时间上来讲，汉朝是儒家思想大放光彩的时代。特别是汉武帝以强化中央集权为中心策略，而董仲舒用儒教的观点将天子的统治权理论化，发展了代表上天意志的阴阳五行学说，并因设置五经博士、推崇孔子的学说而深受汉武帝赏识，形成了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长期垄断局面，儒教自此成为中华帝国唯一正统的学问。当然，在西汉创立之初，人心思定，百废俱兴，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也曾占据过上风，但如何积极地振兴学术、改革朝政，推动社会发展，儒教则发挥出了更为积极的作用。所以，汉武帝的“独尊儒术”也是顺应民心的举措之一²⁾。这样，儒家思想逐渐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延伸，对城市的规划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任何东西的传播都需要有个载体，儒教也不例外，并且可以分为两个层面：文化层面的和（时间）空间层面的。所谓的文化层面就是文化观念的表象。华夏民族很早就发明了汉字，并以其独特的结构形式来传播思想。汉字的组合坚固、直观、平衡、规范、统一，还具有运用性强、信息量大、超时空等特点³⁾。比如“中”这个字，就是上为天，下为地，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意思，所以“中”字在华夏文明当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。城市理论的萌芽是在文字的发明之后，所以汉字的思维模式也最直观地反映出城市的形态。以“城郭”为例，“城”是用“土”围成，由士兵持“戈”守卫的地方；“郭”，原先由“邑”（村落）和“享”（街道）组成，城和郭组合在一起，就表示既有空间概念，又有生产内涵，还有政治和军事意义的一种组合。再比如“中”字当中的那个“口”，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人为的文明现象：城市的雏形，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均由城墙维护，居中者为贵。这是第一个层面上的概念。

（时间）空间的层面主要体现在城市的规划上，又可以再细分为两个方面：城市的形态与社会精神。前者关系到城市的规划及建筑，包括城墙、关隘、房屋和道路，不同城市区域的划分，以及按照礼的秩序严格规定的城市高度和规模，甚至涉及到建筑材料、内外装饰以及色彩绘图等细节方面，有关这一方面在下文中将详细讨论；后者划分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和华夷秩序，对外强调中原与周边民族在文化上的差距，将空间排列的五服概念（甸服、侯服、绥服、要服和荒服）与儒教的社会等级相对应：天子、诸侯、公卿、大夫和士，突出天子、突出中华文明；对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长幼尊卑、君臣父子关系，以维护城市社会的稳定与长治久安，建立理想的儒教世界秩序⁴⁾。

二、儒教思想与城市规划

日本学者牧口指出：平原民族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海纳百川的心胸，最容易形成大一统国体并建设城市，而平原的学术往往和天象、星宿、黄道、经纬度有关，占星术、数学、几何学比较发达，尤其是对浩瀚无涯的天空有奇妙的幻想，由此产生崇拜与敬畏的心理⁵⁾。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诞生在黄河与长江流域，较早就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和与之相应的礼的秩序，并通过与周边民族的商业、文化交流，规范了城市的形态、空间的划分和建筑的等级，由此衍生出许多的理论观点。可以说，中国封建城市从诞生之日起，就有了相对统一的规划意识，概括起来，可

以分为:

1) 宇宙天象观

古人认为,天穹是圆的,大地是方的,即所谓的“天圆地方”。所以将九州想象为方形,将田地划分成井字形,从中脱化出早期城市的形态,其中又隐含着占有天下之意。而日月星辰、春夏秋冬和人的繁衍生死、社会的盛衰更替都有一定的运转规律,即所谓“天有四时、五行、九解、三百六十日;人亦有四支(肢)、五藏、九窍、三百六十节。天有风雨寒暑,人亦有取与喜怒”(《淮南子》)。因为天是圆的,所以祭天的圜丘必须是圆形,否则就会违背天意,如北京的天坛。祭地的叫地坛,是方形,所谓“天坛制圆,三成(层),地坛制方,二成”,就是说天一定要比地高才行。

为了遵循“天”的规律,在城市的选址和规划方面就非常重视“风水”和“象”的观念。风水学(古称堪舆)是在现代科技未发达之前对城市地理条件的考察方法,对山势、水流、气候、物产有严格的要求,理论上归结为“四神庇护”,这方面的研究很多。“象”则是对宇宙的体会,将对天象的观察结果运用到城市的规划中来,称之为“以象制器”。比如隋代的宇文恺在规划长安城的时候,以皇城前面的四行横列坊象征一年四季,南北向的九排象征王畿九辅,皇城东面的十三坊象征十二月加闰月等⁶⁾。其它如北斗、二十八宿星座等也都对城市的形态产生影响。

2) 天人合一观

有了宇宙观念的理论,也就诞生了人类社会的准则,而在儒教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“天意”。因为人与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,能够相互影响,只要人的行为符合天的精神,就能够得到富裕与平安。周公(姬旦)创立了“以德配天”的宗教政治伦理观,从理论上决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任务、人和自然的关系、人性与人之间的关系等⁷⁾。董仲舒在《举贤良对策》中还说:“人受命于天,固超然异于群生”,强调了人的重要性,把人作为整个哲学体系的中核。所以无论是先秦的“天道”与“人道”、两汉的“天人感应”论与自然论,魏晋南北朝的“自然”与“名教”,还是唐朝的“心性本体”论,宋朝的“天人之说”等,都脱离不了这个理论的束缚⁸⁾。古人认为,乾坤为宇宙万物的基本,凡属刚健的就为上(乾),柔顺的就为下(坤),如天对地,父对子,君对臣民等⁹⁾。为什么这样看呢?因为天子能参天地,能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,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,所以要居住在宽敞、宏伟的宫殿里,外面还有高大的城墙和宽深的壕沟来维护¹⁰⁾。古人常将皇宫称为“紫禁宫”,比喻的就是天上的紫微星垣—北极星,它在中国的哲学中代表着宇宙的本源—太极,是永恒的,至高无上的。天子代表了天,所以是地上的中心,“王者必居天下之中,礼也”(《荀子·大略篇》),皇宫在城市的规划中大都位于中轴线的北端。

从秦帝国的首都咸阳的规划上也能看出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:以渭河为天河,南北构筑宫室,以阿房宫为天极和中轴线,南山为宫阙,城周围的270余座宫殿如众星拱月一般围绕天极。同时大力充实京畿,将六国的财富和富民、人才集中到关中,以体现出皇权的尊贵¹¹⁾。汉代在规划方面继承了秦制,也继承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城郭分工概念,长安作为“圣主之居”,皇天所观视”的地方,同样追求大和广(“必以大,用胜服之”)。比如《汉书》郊祭志·第五下载,建章宫新起于甘泉宫的基础上,东面是凤阙,高20余丈,西面是数十里虎圈(白虎),北面是大池,称秦(太)液,有蓬莱、方丈、瀛州、壶梁,象征海中的神山及各种鱼虾,南面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(朱雀),给人以

“四神庇护”的神圣感，未央宫在建章宫的东面，大致在长安的中央，所以雄伟高大（“前殿度高未央”），体现出天子的优越地位。后来的隋唐长安也继续这个理论，按照严格的《周礼》规制，东南西北各设3条大道，宫殿的位置位于中轴线的北侧，意味着城市按照天象五行的规律在运转¹²⁾。

3) 空间方位观

建立在宇宙天象和天人合一观基础之上的是城市的空间划分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阴阳五行和空间排列。按《易传·系辞上》的说法，太极是宇宙之本，太极生两仪（阴阳）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业，反映出自然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影响¹³⁾。东方和南方属阳，是左手，尊位，西方和北方属阴，是右手，卑位，重要的建筑都必须安排在城市的东西方和南方。太庙的等级高于社稷，位置在左边，所以在城市规划中是“左祖右社”，朝的地位高于市场，也高于寝宫，所以才有“前朝后市”、“前朝后寝”之说¹⁴⁾。因此，阴阳学说既决定了建筑的朝向，如“紫气东来”、“瑶池西望”，就是说建筑要东西走向，重要的标志要朝东，以符合风水中的纳“气”原则，所以长安、洛阳的东阙都特别高大；又决定了建筑的形态，比如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（卷六）中说：“高台多阳，广室多阴，远天地之和也，故人弗为，适中而已矣”，即宽阔和高低适度才能符合阴阳的要求，所以中国城市的建筑群体大都向平面扩展，而且广设庭院，同时用通衢大道来保证城市的阳光和通风，与希腊·罗马密集的向高空发展的建筑形式成为鲜明的对比。

古人将世界看成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，称为“五行”。比如在《洪范·九畴》的第一项即谈到五行。反映到城市规划当中，就成为人格化的方位概念：木是东方，主王者的“威仪容貌”，严格等级；火是南方，指“南面向明而治”，约束王者举群贤、运四佞；土是中央，主天子诸侯宗庙大小高卑有秩，九族亲疏长幼有序；金是西方，指军事行动，出军行师，攻城掠地。水是北方，建宗庙，收魂气，春秋祭祀，以终孝道（《志》第十七·五行上）。

定好方位，才能进一步划分城市的内外区域，如政治中心区、市民生活区、经济交流区、宗教活动区、礼制建筑区，甚至还有农业生产区等。一般来说，中国的城市大都是四方型的，由垂直交错的街道和规划整齐的条坊来划分区域，由内至外大致有宫城、皇城（内城）、外城、近郊和远郊五层，居中者为尊。城郭的外部也分成“郊、甸、稍、县、疆”五区，位置不同，重要性也不同¹⁵⁾。再向外扩大，就成为华夷之别的五服概念，离中心最远的就是蛮夷之地，被认为甚至不存在城市文明。

4) 中心对称观

实际上是儒教“中庸之道”的体现，《易经》认为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”，只有“守中”才是最深刻、最适当的。因此，在城市规划中很重视中轴对称的概念，但它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。比如西汉长安是先筑宫殿后建城垣的，闾里与宫室混杂，给城市规划留下的余地不大，没有明确的城市轴线和区域分割。东汉洛阳有所改进，宫殿、园囿自南向北沿中轴线排列，开始突出皇家的地位。到了汉末的邺城，宫殿被移动到全城中轴线的北部，以利南半部城区的交通。北魏洛阳城的南北轴线更加明确，行政官署都排列在轴线两侧，还增加了东西两市，逐渐为隋唐长安的规划奠定了基础¹⁶⁾。众所周知，隋唐长安的宫城南北各有三门，东西各两门，将太庙、太社、六省、九寺、一台、四监、十八卫包括在内。宫城的正门是承天门，为大朝。太极殿是皇帝的听

政处，位于中轴线北端，两仪殿在太极殿北面，虽然号称内朝，实际是“寝宫”之属，故按“前朝后寝”的传统排列（《大唐六典》）卷7、工部，郎中等条）。后来建大明宫，位于长安最高处——龙首原，居高临下，地势开阔，仍保持以丹凤门、含元殿、宣政殿、紫宸殿、太液池（中间是蓬莱山）为轴线的布局。特别是长安城的“城坊”均按中轴线排列，不仅使布局更加整齐，在管理上也更为科学。明清的北京城也延续了这个传统，自南向北由永定门（东西为天坛、先农坛）、正阳门，紫禁城（左右是太庙、社稷坛）、景山、钟鼓楼为顺序构成轴线排列，皇宫位于中轴线中心的显要位置。

5) 礼乐秩序观

作为维系封建统治的支柱之一，礼制建筑在中国的城市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《左传》说：“夫礼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仪也，民之行也”，这是天人感应的基本。系统的礼秩序自周之后形成，所谓“大礼三百，小礼三千”即是如此。汉武帝以来，礼制建筑逐渐纳入儒教思想影响下的城市规划当中，如长安的礼制建筑都在中轴线南部的延长线上，辟雍、明堂在东则，社稷，灵台在西侧¹⁷。为什么要把礼制建筑放在城市的南面呢？这是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逐渐形成的。汉代成帝时，御史大夫（张）谭奏言说“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，承天之序，莫重于郊祀，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——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镐，成王郊于雒邑。由此观之，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，可见也。”就是说，帝王的行为反映着天的旨意，同时根据阴阳学说，“兆于南郊，所以定天位也，祭地于大折，在北郊，就阴位也”，天应该是阳位，祭天当然要在南面。所以“言天以文王之都为居也。宣于长安定南北郊，为万世基也，天子从之”（见《郊祀志》·第五下）。

汉以后各朝都在礼制建筑方面继续创新，规制也越来越烦琐。除了天坛、地坛、先农坛、朝日坛、夕月坛、社稷、祖庙、孔庙、关帝庙、元圣周公庙、文昌帝君庙、城隍庙、地祇、直省神祇等之外，还严格规定了建筑尺度和祭祀时间，比如太庙殿“正室十四间，东西储各一间，合十六间，栋高八丈四尺”，其目的是显示统治的威严和高于四夷的文化（《晋书》）志第九·礼上）。礼制建筑甚至在色彩等细节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。比如自西汉中叶后崇尚土德，天子专用黄色，以后历朝历代也尊崇黄色，任何官僚百姓均不可使用。礼制还运用立法形式来管理社会，维护等级之间的严格界限，即所谓的“度”、“节”、“制中”等，具体到如舟车装饰、厅堂结构、屋顶鸱吻及瓦当砖刻等。

在古代的城市中不可忽视的还有礼制建筑与“乐”的密切关系。《礼记》说过，“大乐与天地同和”，作乐是为了“以应天地之和，以合阴阳之序”。所以制十二和之乐，合三十一曲，八十四调，祭圜丘用黄钟，方泽用林钟，宗庙用太簇，其他五郊、朝贺、飨宴等“则随月用律为宫”。在礼乐方面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制，比如天子用十二钟，上公用九，侯伯七，子男五，卿六，大夫四，士三等。对礼乐何以如此重视？显然因为它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。比如唐太宗奠定帝国基础之后，曾对臣下说：“朕虽以武功定天下，终当以文德绥海内”。经过战乱之后，礼乐俱废，有必要制定新的乐和词，以示大唐绥靖四海的威望，而且规定不同的宫殿及历代宗庙均要有自己的乐（《唐书》志八）。

6) 吉祥数字观

对城市规划带来重要影响的,还有吉祥数字,如三、五、七、九,或者四、六、十二、二十四等,都与八卦有一定的关联。这与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,特别是试图从中发现固有规律的思维方式有关。比如用《易经》来解释自然天象和宇宙万物,其本源是六爻,十二个月、二十四节气、六十四卦、七十二候等都从此演绎而来¹⁸⁾。结合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,吉祥数字就直接反映出统治阶级的需要。如周朝时对天子及以下的公侯伯子男爵位规定各自拥有城市的尺度,如天子可以有三朝(燕朝、治朝、外朝)和五门(路门、应门、雉门、库门、皋门)的规制,而诸侯只能享受三朝三门,所有的城市规划和建筑都必须遵循此例¹⁹⁾。这些数字(还有七和九)在八卦当中都是阳数,代表上天,所以在城市规划中使用最广。如三:“三才之道,三极之道”,指天、地、人的鼎立;五:“五辰、五行、五官”,仍然是三的外延,指万物的构成;还有九:“九霄、九宫、九逵”,反映出天的至高无上,其倍数就构成隋唐长安皇城前面的三十六坊等²⁰⁾。

在礼制祭祀中也有很多的数字,如确定方位的“八风”;明庶(东)、景(南)、闾阖(西)、广莫(北)、清明(东南)、凉(西南)、条(东北)、不周(西北),供祭祀的二十八宿,六十二神(文昌、北斗、三台、司命、轩辕、后土,还有司空、风伯、雨师、雷电等),还有五岳、四望、四海、四渎、五湖、五帝等,都和礼制建筑有关。其它还有“清和六合”,指东南西北上下的方位,“制数以五”指金木水火土,建筑的布局 and 方向如果符合这些要求,就能够“海内安宁,兴文偃武”。特别是宫殿的位置必须吉祥,因为皇帝要根据季节的不同在各个方位的宫殿居住,这样才能顺天应时。“汉仪,太史每岁上其年历,先立春、立夏、大暑、立秋、立冬,常读五时令,皇帝所服,各随五时之色”(《志第九·礼上》)。日本早期的都城也非常重视阴阳五行的学说,比如藤原京内各宫殿就建造在不同的方位,以便天皇能应时而居²¹⁾。

三、东亚城市的共性

中国同东亚邻国间城市文化的大规模交流,可追溯到秦汉时代。自高祖开国以来,汉朝曾广建城池,尤其以汉武帝时的为多,总计约有郡(国)城103,县城1314,所谓的“蛮夷地区”县城32座²²⁾。前108年,汉帝国在朝鲜东北部设玄菟、真番、临屯和乐浪四郡,推动了半岛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;前111年,汉灭南越国,在汉越边境一带设交趾九郡,实际上已经深入到越南中部的九真和日南,正式推行大陆化的郡县制度。到了唐代以后,中国的城市理论更影响到日本、琉球等地,所以在整个东亚地区,包括朝鲜半岛、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的一部分,也就是越南北半部,都有比较相近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形态。因为在地理环境上,这个地区比较封闭,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。所以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²³⁾。

首先,中日韩越等国的城市大都是政治中心,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统制基点,所以规划整齐,城市的功能也比较雷同;东亚各国大都有京畿、府、郡、县、乡的行政结构,而且各有规制,尤其突出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地位。

其二,城市在选址、规划等方面都有正统的儒教理论作基础,比如讲究风水和“四神庇护”,追求子孙万代的恩泽、富裕、长治久安等。按天象方位确定的皇宫或行政官衙、礼制建筑等的布局

直接影响到城市的规划。

其三，对周边弱小民族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别。各国以中华帝国为楷模，都鼓吹翻版的或者缩小的“华夷秩序”及“五服之制”，因此在中心城市的规划建筑方面都追求高大、宏伟，以体现对外的威慑力，有的在国境处设立关城，以示内外有别，如中国南边的镇南关、西边的嘉峪关、东边的山海关，日本的三关、四界，越南的镇西府（对柬埔寨）镇蛮、镇边、镇宁等六府（对老挝）等。

其四，东亚各国都使用汉字，都接受汉字所带来的思维方式：直观、平衡、想象、重视效果等。在城市的规划中，也同样重视轴线对称和中心性，强调统一、整齐、比例、上下有序；比如以长安、北京为模式的奈良、京都、平壤、汉城、河内等。

其五，都维护儒教伦理的等级秩序。儒教社会讲求“为政之道，以礼为先”，用儒教理论来管理城市，所以必须在空间上划分不同身份的活动区域。日本幕府时代的“町割”也是如此。在时间观念上还实行统一管理，以维护社会秩序，所以在各国的城市中钟鼓楼建筑都享有特殊的地位，即所谓的“晨钟暮鼓”。此外，还通过建筑的格式、规模以及色彩等，体现出政权的尊严和威慑力，体现出华夷、君臣、父子之间的等级差别²⁴⁾。

注释

1) 张岱年“中国哲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学说”

深圳大学编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》三联书店出版，1988年

2) 陈启云“从《庄子》书中有关儒家的材料看儒家的发展”

深圳大学编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》

3) 陈章太“略论汉字与汉字文化的关系”

沟口雄三编、《汉字文化圈的历史与未来》大修馆书店，1992年

4) 拙著《东亚城市的形成与发展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，31页

5) 牧口常三郎《人生地理学》东西哲学书院，1965年，163, 189页

6) 丁俊清《中国居住文化》同济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163页

7) 任继愈《中国哲学史》人民出版社1979，第一册，23页

8) 何舒“理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”深圳大学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》

9) 郑方耕、赵建功《周易与现代文化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8年，38页

10) 刘泽华“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”

复旦大学历史系《中国传统文化再估计》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

11) 贺业钜《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1996年，312页

12) 拙著《东亚城市的形成与发展》59-60页

13) 所谓的两仪、四象（太阳、太阴、少阳、少阴）、八卦（乾坤震坎兑艮离巽），实际上都和自然现象有关，如日和月，春夏秋冬，还有天、地、雷、火、风、泽、水、山等。

见郑方耕《周易与现代文化》第31页

14) 前揭贺业钜《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》258页

15) 前揭丁俊清《中国居住文化》113-14页

16) 刘敦桢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1984年，20页以下

- 17) 前掲贺业钜《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》326页
- 18) 前掲郑方耕《周易与现代文化》29页
- 19) 贝冢茂树《中国古代的国家》中央公论社, 1984年, 18, 278页
- 20) 前掲郑方耕《周易与现代文化》75页
- 21) 拙著《东亚城市的形成与发展》68页
- 22) 前掲贺业钜《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》329页
- 23) 拙著《东亚城市的形成与发展》14-15页
- 24) 拙作“东亚城市”文明圈的形成与变迁 明治学院大学《法学研究》, 1999/3